

新视野·新方法·新资料

——近十年来翁同龢研究述论(2004-2014)

孙 政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自2004年纪念翁同龢逝世100周年的近十年来,近代史学界通过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方法的更新,开拓新视野、采用新方法、坐实新材料,将翁同龢研究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逐渐渗透与扩展,取得了一些令人可喜的进展。但要看到,继续深化翁氏研究,有待于开拓新文化史的视野,并纳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域。立足这一学术空间的拓展,无疑有助于形成更加丰满、完善的历史认识。

关键词:翁同龢;研究视野;方法更新;文献整理;学术空间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15)01-0067-07

DOI:10.16101/j.cnki.cn32-1749/z.2015.01.015

翁同龢(1830-1904)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化艺术家,一生历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并授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翁同龢的是非功过,可谓褒贬不一。1994年和1998年,中国史学会、常熟市政府先后在常熟举办翁同龢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2004年为纪念翁同龢逝世100周年,又在南京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就翁同龢的思想及其生平业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1]当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2],汇集了翁同龢去世后的一百年来有关翁氏评价的代表性论文60多篇,内容涉及其政治思想、外交方略、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关系,以及教育观、人才观、人际交往等多方面,这些成果无疑将翁氏研究推向了高潮,也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时隔十年,史学界在有关翁同龢的研究领域,无论是视野的拓展、视角的转换,还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发掘,均有新的进展,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

一、传统政治史话题的讨论

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看,学界对翁同龢研究的焦点,主要围绕着戊戌年间举荐康有为、开缺革职原因

及其思想立场等问题展开。

(一)举荐康有为说

由于康、梁在戊戌政变后屡有申说,清廷上谕也言之凿凿,翁同龢“荐康”说几乎长期以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何炳棣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撰文指出:“翁、康关系如何先不论,荫桓之荐有为,则无可疑者”,“荫桓引有为戮力改革,实隐然为变法之领袖,非荫桓之先启沃君心,则变法之计不能遽入”。换言之,真正向光绪帝举荐康氏的并非翁氏,而是康有为的同乡、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马忠文通过这一学术史专题回顾,在据以翔实史料,进一步爬梳翁、张、康之间关系后认为,以往研究无论持翁氏“保康”之说,还是张氏“荐康”之论,大多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判断和理解,难免各执一词。欲厘清这桩扑朔迷离的近代公案,必须重新梳理甲午到戊戌期间三人的真实关系;需要考虑到当事人后来推诿责任、篡改毁弃文献、隐讳与夸大事实的种种倾向,以及政变前后清廷高层派系斗争的政治背景等因素。概言之,翁氏“荐康”说的兴起与张氏荐康史实的隐没不彰,除了康、梁“作伪”的因素,还要从政变前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答案。作者撰文指出,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孙 政(1990—)男,江苏沐阳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文化史。

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此说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3]循其信实的史料叙事脉络,力图还原历史场景与语境,不乏辩正的新意。

(二) 罢官缘由

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颁布后不久,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再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翁同龢何以被逐出政治舞台,一直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翁同龢被开缺、革职,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帝出于被迫。但萧公权、孔祥吉等学者认为,是光绪帝主动罢了翁同龢的官。杨天石就此撰文指出,揆诸史实,光绪帝与翁同龢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慈禧太后方面则是次因。翁同龢被“开缺”出于光绪皇帝本意,而非慈禧太后干预。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其原因盖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而又不很了解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师徒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换言之,翁同龢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慈禧只是顺水推舟。^[4]西太后最初并不反对变法,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西太后懿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谢俊美通过梳考迄今为止的多种说法后认为,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只能是慈禧太后,开缺时间及革职编管则是军机大臣荣禄、刚毅一伙人从中做了手脚。具体而言,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5]

马忠文从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的清廷满汉关系切入,指出翁氏戊戌年被罢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翁的开缺根本上说是由最高统治者决定的,但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翁本人对此避而不谈,将刚毅的排挤视为主要原因,也不无理由,至少刚毅对翁的排挤应

是重要原因之一。^[6]茅海建认为,翁氏开缺原因主要是慈禧太后防止翁坐大,以保持中枢运作在其操控之下,当日下旨命“具折谢恩”,更是明宣慈禧太后的权力范围。然若称慈禧太后罢免翁,为打击变法派,似过高估计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预见力,此时变法刚起步,慈禧太后也不明了变法的最后走向。^[7]⁴¹⁸马勇则认为,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既有政敌的报复与暗算,也有自身的失误、不检点,但根本原因似乎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为了新政顺利推行,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而作出的选择。^[8]

上述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翁氏罢官缘由,尽管意见纷呈,颇显分歧,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此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三) 思想立场

作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翁同龢一生充满矛盾的思想演变历程,素为学界所关注,就此得出了改革派、保守派的不同看法。

李元鹏从晚清传统社会变迁及政治事件的发生对翁同龢的影响入手,揭示了翁同龢由坚守传统转向赞同“中体西用”论的心路历程。作者指出,两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及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翁同龢从理论上认识到西方军事科学可抵御外侮、洋人非夷狄之辈。但作为清流派的代表,作为儒家精神的代言人,他又害怕西学影响传统的道德伦理、社会生活及思想意识。从感情上他又维护着传统,因此在欲变、欲不变中犹豫、徘徊。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前成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赞同者,成了洋务观的实践者。^[9]有学者分析了翁同龢的爱国思想,既有传统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痕迹,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展出新特色,表现在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从赞同洋务到支持维新等方面;同时认为其爱国思想是在民族危机、西学东渐的浪潮、儒家匡时济世的传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10]上述观点,不乏追踪翁同龢思想的过程演进,具有接陈启新的矛盾特征分析。

就后世大多视翁同龢为改革派的观点,马忠文提出了质疑。他在厘清翁同龢开缺前后朝野的响应后发现,当时各界对其罢官缘由虽有不同意见,但几乎都认为翁为守旧者。这种新一旧的极端反差,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翁在政变后被打入康党是各种力量政治斗争的产物,翁不是因支持康梁变法而成为康党,而是在被打成康党后变成维新人物的。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宣扬翁同龢支持变法,

清廷也因翁曾力荐康梁支持变法为由将其革职,这些使得翁氏改革的新派形象得以确立。翁同龢身上的“新”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带有鲜明的政争意味。作者同时指出,揭示戊戌年春翁氏“旧”的一面,只是出于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考量本身,并没有对其做出否定性评判的意味。谨慎与稳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为“守旧”,这样的“旧”比起那些漫无章法、急功近利的“图新”并非毫无意义可言。^[11]

也有学者从传统的封建科举选官制度入手,认为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因循守旧、暮气沉沉、鄙视自然科学的封建文官集团,翁同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由此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就不能振衰起弊,有所作为。^[12]还有学者指出,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并不符合实际。翁同龢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旧文人,也是一位在官场中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客,绝不是一个自觉地追赶世界潮流、对工业文明成果有着身体力行的明智官僚。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一种决策集团外的政治力量巩固自己朝内、朝外的地位,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的实施办法。^[13]

翁同龢作为甲午战争的主战派代表,一直为学界所称颂。但姜鸣对此不无己见,在他看来,翁同龢主战的出发点是相信海陆军尚堪一战,但在整场战争中除了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在马关议和前夕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其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作为想辅佐皇帝独振乾纲的“后清流”官员,有心杀贼,无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战。进一步分析,也暴露出整个清政府中枢确不具备与日本相匹敌的具有世界眼光和手腕的政治家集团,比之于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的决策圈和激扬文字的“前清流”,并无大的长进,这就是翁同龢们的悲剧所在。将翁同龢的主战心路放在晚清“清流”现象中加以考量,从中看到的是传统士大夫在新旧交替时代面前的无奈和徘徊。^[14]

二、开拓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空间

近几年来,翁同龢研究的学术空间有了涉及文化艺术、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为官品格、家族文化等不无广度、新意的延伸与扩充。

(一)文化艺术

戚学民在考察翁同龢学术宗主与交游后指出,翁氏学术较为驳杂,但对阳明学有特别喜好,其论学宗

旨和读书记录、人际交往都显示了阳明学的深刻影响,他与好友豫师、李鸿藻、徐桐等帝师对阳明学的学术倾向,超越了个人喜好,与晚清阳明学的复兴有着重要的关系。^[15]黄永辉、王倩分别就其诗学交游、诗学思想、诗歌思想内容及其艺术风格等作了系统探讨。^[16-17]罗勇来分析翁同龢碑帖兼融的书学思想和书法艺术,认为其书法艺术使深厚的传统技法与性情抒发之间达到了和谐、自然、统一的完美典范。^[18]邵宁也以翁氏书法为个案,力求勾勒一个比较全面的翁同龢书法形象及晚清书坛现状,明确了翁同龢在晚清书法史上的地位。^[19]江山就翁同龢收藏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作了探讨。^[20]胡燮敏则结合翁氏日记、诗文,整理归纳了所记家乡常熟的民俗风情,包括祭祖、结婚、祝寿、丧葬以及俚语乡谚、迎神赛会等习俗,认为他的民俗观体现了儒家的尽忠报国、家庭的尽孝报族、家乡的眷土恋民等思想。^[21]

(二)人际网络与日常生活

近十年来,有关翁同龢的人际网络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走向,不仅有同僚、同年、同乡及师生等关系,还扩展到了中外关系、家族关系等层面的关注。

前述马忠文《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一文中就翁同龢与刚毅、荣禄之关系多有考辨,认为戊戌年春策动将翁罢职最有力者是军机大臣刚毅而非荣禄。由于康有为、梁启超在政变后极力攻击荣禄,将其视为慈禧发动政变的帮凶。受其影响,人们多将荣禄视为排挤翁氏的主要人物,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作者认为,翁同龢开缺虽与刚毅、荣禄等满洲权贵难脱干系,但必须全面考量,似不可简单视为满汉矛盾的产物。贾熟村考察了刘铭传与翁同龢兄弟的恩怨,认为双方在修筑铁路等方面存在不同政见,但并未太多地影响他们的私谊。同时基于赫德致翁函、电文和翁氏日记的记载,研究了赫德与翁同龢的往来。^[22-23]陆玉芹着重梳理了甲午战争中分别代表帝后两党的翁同龢与徐用仪之关系,指出两人在和战、割地和赔款等问题上多次相争,但并无证据证明徐用仪的罢官是由翁同龢指使的。^[24]另外,也有学者就翁同龢与王蓉洲、谭钟麟^[25-28]、赵宗建^[27]、吴昌硕^[28]等不同层面的交往事迹做了专文考辨。朱育礼、朱汝稷探讨了作为晚清政治精英世家常熟翁氏与湘乡曾氏之关系,认为二大家族同秉修齐治平之训,同具经世致用之学,同为朝廷重臣,又同处于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他们审时度势,倡办洋务,推行新政变法,都属

政治精英。难能可贵的是两家的父子兄弟都能捐弃私怨(尤其是翁同龢以德报怨),共纾国难。在洋务、外交、财政等方面精诚合作,为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谊延数世的君子之交。^[29]

与此同时,翁氏的日常生活被纳入了研究视野,人物形象因此更为丰满和立体。仲伟行考证了翁氏开缺回籍后的生活居处,认为翁氏晚年除山居于瓶庐外,在城区的居所则从塔前张宅至南泾堂翁宅,再移至翁宅后门报本街,直至去世。^[30]周立人通过对翁氏晚年日常生活的考察,揭示了翁氏的爱国情怀、乡梓情怀、民生情怀,再现了晚年翁氏乡居生活的真实图景。^[31]王忠良、沈潜著《翁同龢》一书,将历史对象置于宏观的时代背景中解读,又在家庭、情感等微观细节上把握,写出翁同龢的乡情、亲情、友情,体现“人”的性情、“变”的心路,刻画他在矛盾纠结中传承并守望一生的家国情怀、文化情怀、民生情怀。^[32]沈潜结合1872-1874年翁同龢在籍丁忧的日记梳理,追踪了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认为乡居期间的翁同龢赖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为自己的日常生活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士绅的文化交往空间。借以翁同龢在这一场域的交往惯习,不难看出他内在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和思想性格。^[33]陈艳飞则依托翁同龢日记与家书资料,对翁同龢及其家族成员的日常健康维护与和医疗活动作了详细论述。^[34]

(三)为官操守

人物研究离不开对个人操守、品行的认识。近年来基于反腐倡廉的现实关怀,学界结合翁同龢在晚清政坛为官数十年的从政品格、操守等精神遗产,做了鉴往知来的有益探讨。2011年翁同龢纪念馆编纂出版的《碧水琴川——翁同龢精神遗产与廉政文化》,汇集了谢俊美《晚清官场勤政廉洁的典范——翁同龢》、戴鞍钢《晚清政坛与翁同龢的操守》、杨增麒《勤政——翁同龢清正为官的重要表现》、李梦芝《为官清正,操守廉洁——对翁同龢回籍安葬父、兄、妻一行的考察》、田玉洪在《清洁自持翁同龢——从礼单观察翁同龢的官场人生》等38篇文章。以上论文从不同视角、材料、方法,充分论证了翁氏勤政廉洁、尽忠职守、洁身自爱的从政操守。

(四)家族文化

翁氏家族在藏书、文学、书画艺术等方面卓有成

就,为海内外所瞩目。曹培根著《常熟翁氏藏书世家》,从翁氏文化世家入手展示其家族的文化精神,全面反映翁氏在藏书、文学、书画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及翁氏明清官绅名宅文化。^[35]沈潜撰文指出,翁氏家族在代代传承的家风熏染下,通过科考而仕途进身,由耕读之家酿成文化世家,以读书立学、著书立说为职志,重视自身的文化积累与建设,凸显家族的品行修养与文化遗产,秉承了清廉自律、志在报国的优良家风,堪称地域文化的独特精神坐标。^[36]

此外,以往研究者对于翁氏日记的文本史料价值关注,往往侧重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联的钩沉,近年有学者就日记的文献特质^[37]、日记的戏曲史料价值^[38-39]以及基于日记的历史气候变化^[40-43],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开掘了翁氏日记所负载的丰富历史信息。

三、重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

较之过往对翁氏家族文献整理与研究重视不够的倾向,近十年来该工作有了令人欣喜的新进展。

以《翁同龢日记》为证,十年前已有三个版本(1925年张元济影印本、1970年赵中孚编辑的台湾排印本和1985年起陈义杰整理的中华书局版本)。近年翁氏后人推出新版《翁同龢日记》八册^[44],新版本首次以家藏日记手稿原件为底本,并增补了翁同龢早年日记两种以及军机处日记、自订年谱等,编者逐字校订,查漏补缺,对历次删隐做了完整复原,可称目前翁氏日记中最完整的一个版本。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新版本编制了日记的人名索引作为附卷。^[45]诗文编纂工作中,谢俊美所编《翁同龢集》,包括奏疏、函稿、诗词联对、文录、松禅自订年谱、甲午日记和随手记及附录七部分,成为研究翁氏生平、翁氏家族和晚清社会的重要资料。^[46]朱育礼、朱汝稷校点《翁同龢诗集》^[47],汇集了迄今能搜集到的翁氏全部诗词作品,据以《瓶庐诗钞》、《瓶庐日记》等多种版本等校标,并辑补佚诗100余首。《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辑录432件罕见的翁同龢手稿墨迹,分为“尺牍辑萃”、“诗文辑佚”、“语录辑要”和“杂件辑存”四部分,计有尺牍、诗、文、语录、封面题词、杂件六类,展示了翁同龢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48]书信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原始资料。赵平把现存翁同龢与同僚间的858封书信加以辑录,就致信人概况、与致信人交往、书信所涉相关背景及疑难词句进行笺释,将原本不被重视的书法作品转化为书信集文

本。^[49]令人瞩目的还有翁氏家族成员日记的整理。翁心存是翁同龢之父,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朝廷重臣,张剑先后倾心整理《翁心存日记》^[50]、编校《翁心存诗文集》并出版^[51]。此外,包括翁同龢嗣子翁曾翰、侄孙翁斌孙、曾孙翁之熹等家族成员的日记也陆续整理出版。^[52]这些近代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对研究晚清史及翁氏家族无疑有着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史料考订方面。仲伟行著《翁同龢日记勘误录》,将日记稿本与排印本对比,纠排印本之字句脱漏、衍误等7000多处。^[53]卞孝萱、武黎嵩利用《海虞翁氏族谱》加以考订补遗,编制了海虞翁氏始祖翁景阳至翁同龢世系图及主要成员情况简表,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解读。此外,针对新编《翁同龢集》在时间考订、文本移录、断句标点、人物注释上存在的讹误,姜鸣、李红英、都榭等学者就此多有考订和修正。^[54-55]李红英结合国家图书馆藏翁氏家书,就《翁同龢集》中所收书札加以考证,纠正函稿中的系年错误400余处,总计18万字陆续刊出。^[56-59]

四、深化研究的努力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的活跃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历史研究出现了范式的转变与方法的更新,研究视角也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逐渐渗透与扩展。因此,政治史看似有了日益边缘化的倾向。毋庸讳言,在泛政治化语境的传统叙事框架下,过去对于历史人物的关注点,往往放在对政治斗争、权力关系、政治事件的过程作宏观叙事,人物形象因此多有演绎政治理念的功能及符号,难免了单一化、程式化、教条化,甚至脸谱化的缺憾;也因理论框架的空洞、问题意识的缺乏,难免研究选题的陈旧、内容的重复。政治史与社会史其实并不对立,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可以交相互补。不同的视角与方法,无疑可以挑战传统的史料认识。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要在立足于“整体史观”的视野中,以具体的历史场景感,寻求各因素之间的内在互动,渐成细化、深化的趋势,这样有助于彰显被遮蔽了的真实面貌。

历史上的翁同龢是一个集内外矛盾于一身的人物,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翁氏研究的纵深拓展,需要突破以往传统研究范式的窠臼,注重历史人物的多重面向和具体细节。笔者认为,不妨在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推进:

一是继续开拓新文化史的视野。史学是人学,社会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连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将日常生活、社会网络纳入研究视野,有助于深入人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与观念世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就深化翁氏研究而言,譬如,由日记不难发现,翁同龢的身体状态几乎一直与病况相缠绕,身体的变化起伏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安排与社会行为抉择产生影响。从身体史的视角切入,也许可以看到许多过往被忽略了丰富内容。再譬如,翁同龢一生有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关注其不同时期的经史文本阅读,可以再现他的知识谱系、思想底色、价值系统的构建与铸造、丰富与绵延。此外,有关情感史、交游史、收藏史、家教史等等,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味。类似多维的视角观照,虽然不无“碎片化”的影像,但可以从历史的宏大表象下挖掘出少为人知的潜流,对追寻翁同龢的心路历程形成一种多侧面的解读,将“碎片”串联组合,有益于整合起个体生命鲜活生动的立体形象。前述王忠良、沈潜新著《翁同龢》的有益尝试,就避免了程式化、脸谱化的叙述,使读者不仅能看到有血有肉、真实自然的翁同龢形象,更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从不同的侧面梳理、回顾了晚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走向。

二是纳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以此为视角切入,把考察点放置在地方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大而粗、笼统而宏观的弊端,有助于给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和面貌,多姿多彩的叙事中更能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可靠,通过碎片的拾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政治史的图像。翁同龢不仅是有全国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是江南区域社会的标志性人物;翁氏家族又是著名的江南文化世家,内涵深、影响大、层次高,资料多且保存较好。作为区域社会的代表性士绅,伴随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翁同龢及其家族的人生事业及精神内涵,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与区域社会的双向互动,不失为考量社会变迁与士绅演化的典型个案文本。有学者在2013年翁氏文化专题研讨会上指出,有清一代,江浙地区基本上是中国学术的中心。时至晚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兴起,是整个南方人参与中国内阁中枢、权力中心的开始,到翁同龢参与军机的几十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因此可以说,翁同龢是代表江浙文化的最后一人,之后江浙地区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慢慢退守了。在此意义上说,研究翁同龢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历史,也不

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而是整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流变的一个缩影。以翁同龢为视角和出发点,去研究翁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完全可以写出一部更全面、更透彻的中国近代政治生态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著作。^[60]应该说,这是今后翁同龢研究值得开拓的一个方向。

总之,近十年来,学界对于翁同龢的研究并未因十年前翁同龢逝世100周年纪念的高潮而相对沉寂,无论是在研究视域、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资料等多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我们相信,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视野的拓展,随着翁氏文献资料的不断开掘发现,翁同龢研究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

参考文献:

- [1]沈潜,陆玉芹.纪念翁同龢逝世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J].学术月刊,2004(12):122-123.
- [2]翁同龢纪念馆.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 [3]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J].近代史研究,2012(1):4-28.
- [4]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J].近代史研究,2005(3):198-216.
- [5]谢俊美.翁同龢开缺、革职原因考[J].江海学刊,2008(3):11-17.
- [6]马忠文.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38-447.
- [7]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M].北京:三联书店,2009.
- [8]马勇.翁同龢罢官记[J].传记文学,2008(12).
- [9]李元鹏.从固守传统到中体西用——翁同龢心路历程探析[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04.
- [10]陈丽峰.试论翁同龢的爱国思想及其成因[J].历史教学问题,2005(4):80-83.
- [11]马忠文.从朝野反响看翁同龢开缺前的政治倾向[J].南京大学学报,2013(2):108-116.
- [12]楼宏峰.科举误国——从翁同龢看传统文官体制下晚清政局的必然走势[J].贵州文史丛刊,2005(2):50-54.
- [13]山谷.翁同龢:维新还是守旧[J].国学,2011(8):56-59.
- [14]姜鸣.失鹤零丁——寻访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M]//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6:50-73.
- [15]戚学民.翁同龢的学术宗主与交游兼论其对晚清学术的

影响[M]//近代史学刊(第10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1-40.

- [16]黄永辉.翁同龢诗歌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2008.
- [17]王倩.翁同龢诗歌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文学院,2012.
- [18]罗勇来.翁同龢碑帖兼融的书法艺术[J].书画艺术,2004(6):40-45.
- [19]邵宁.翁同龢书法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06.
- [20]江山.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5-68.
- [21]胡燮敏.翁同龢与常熟风俗[G]//政协江苏省常熟市委委员会,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内部资料).2008:109-135.
- [22]贾熟村.刘铭传与翁同龢兄弟的恩怨[EB/OL].新浪军事,(2005-10-12)[2014-10-12].<http://mil.news.sina.com.cn/2005-10-12/2314324900.html>.
- [23]贾熟村.赫德与翁同龢[J].东方论坛,2010(5):1-5.
- [24]陆玉芹.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68-74.
- [25]钱文辉.翁同龢与王蓉洲[G]//翁同龢精神遗产与廉政文化(内部资料).常熟:中共常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熟市委宣传部,2011:144-146.
- [26]陈可畏.翁同龢与谭钟麟的交谊[G]//翁同龢精神遗产与廉政文化(内部资料).常熟:中共常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常熟市委宣传部,2011:147-152.
- [27]吴正明.翁同龢与赵宗建[G]//翁同龢研究(第2期)(内部资料).常熟:常熟市翁同龢研究会;常熟市历史文化研究会,2010:85-89.
- [28]侯开嘉.吴昌硕与翁同龢交往事迹考辨[C]//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302-310.
- [29]朱育礼,朱汝稷.常熟翁氏与湘乡曾氏之恩怨[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杭州师大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8-169.
- [30]仲伟行.翁同龢晚年居处考[M]//近代中国(第18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01-510.
- [31]周立人.翁同龢晚年思想述论[J].历史教学问题,2008(1):92-95.
- [32]王忠良,沈潜.翁同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 [33]沈潜.试论翁同龢的江南区域交往空间——以1872-1874年在籍丁忧为视界[M]//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6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29-148.
- [34]陈艳飞.翁同龢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健康维护与疾

- 病治疗为例的探讨[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
- [35]曹培根. 常熟翁氏文化世家[M]. 扬州:广陵书社,2009.
- [36]沈潜. 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37-43.
- [37]徐雁平: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3):122-128.
- [38]曾凡安. 论《翁同龢日记》的戏曲史料价值[J]. 戏曲艺术,2010(2):30-33.
- [39]黄卉. 同治光绪年间清官演戏宫外观众考——以《翁同龢日记》为线索[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13-120.
- [40]张学珍. 《翁同龢日记》记录的19世纪后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J]. 古地理学报,2006(1):117-125.
- [41]张学珍,方修琦,齐晓波. 《翁同龢日记》中的冷暖感知记录及其对气候冷暖变化的指示意义[J]. 古地理学报,2007(4):439-446;
- [42]费杰,胡化凯,张志辉,周杰. 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研究——基于《翁同龢日记》[J]. 灾害学,2009(3):116-120;
- [43]张学珍,方修琦,郑景云,郝志新. 基于《翁同龢日记》天气记录重建的北京1860~1897年的降水量[J]. 气候与环境研究,2011(3):322-328.
- [44]翁万戈,主编. 翁同龢日记[M]. 翁以钧,校订. 上海:中西书局,2011.
- [45]翁以钧. 《翁同龢日记》人名索引[M]. 上海:中西书局,2013.
- [46]谢俊美. 翁同龢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47]朱育礼,朱汝稷,校点. 翁同龢诗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48]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藏翁同龢未刊手稿[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 [49]赵平. 翁同龢书信笺释[M]. 上海:中西书局,2014.
- [50]张剑,整理. 翁心存日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51]张剑,辑校. 翁心存文集[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 [52]张方,编校. 翁曾翰日记[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 [53]仲伟行. 翁同龢日记勘误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54]姜鸣. 《朴园越议》研读——评新近编校之两种翁同龢史料文献[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05-118.
- [55]都榭. 翁同龢致张謇文稿系年考订[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20-126.
- [56]李红英. 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考(1887)[J].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68-72.
- [57]李红英. 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致费念慈书札考释[J]. 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63-65;
- [58]李红英. 翁同龢致阎敬铭手札系年考[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4):14-18;
- [59]李红英. 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1898-1902)系年考[M]//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3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54-366.
- [60]翁同龢纪念馆. 观点:重返历史现场,温情解读翁同龢[Z]. 翁同龢纪念馆馆讯(第11期),2013.

New Vision, New Methodology and New Materials: Weng Studies of the Past Decade (2004-2014)

SUN Z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It is nearly 10 years since we commemorate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Weng Tonghe in 2004. By changing research paradigms and updating research methods, the modern historiography circle has begun to develop a new vision, use new methods and make new materials to infiltrate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of Weng Tonghe from the political history to the new research field like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Gratifying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se researches. But it is noteworthy that when the Weng Tonghe research has begun to be studied further, we should expand the vision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bring the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into our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e expansion of this academic space will help us enrich and improve our knowledge of history unquestionably.

Key words: Weng Tong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updated methods; literature review; academic space